

●综述·评介

●申 畅

中国目录学发展简论

“目录学”一词由来已久,宋代苏象先在其所著《苏魏公谭训》里,就有“目录之学”四字的记载。其实,据史料考证,在宋代之前,尽管“目录学”一词不见经传,但目录、目录工作和目录学,均已出现和存在。考古学家发现,甲骨书有的按时代贮存,有的按组贮存,有的按类贮存。孔子整理六经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目录学知识:其一,精选文献,如《诗经》,原来有3000多篇,后删定为311篇;其二,采用多种分类,如《国风》按地区分类,《雅》按时代分类,《颂》按性质分类;其三,编写提要,为《诗》、《书》撰有“言其作意”的序;其四,为“六艺”各篇厘定次序,尽管不标明序号,但次第基本上是固定的。

到了汉代,杨仆编制了我国第一部不甚完善的专科书目《兵录》;特别是刘向、刘歆父子,负责整理国家藏书,在汲取前人之长的基础上,不仅有周密的计划和组织,更编出了我国第一部提要目录《别录》和第一部国家书目《七略》。此二书是继往开来,发凡起例之作,被誉为我国目录学的鼻祖。自此以降,中国的目录、目录工作、目录学才走上了真正的发展道路。

在《别录》和《七略》的影响下,目录、目录工作先后形成三大系统:

一、官修目录。官修目录截止明末,计有66种,加上清代的就更多了,重要代表作除《七略》以外,主要有:《晋中经簿》、《晋元帝四部书目》、《隋大业正御书目录》、《群书四部录》、《崇文总目》、《秘书监制》、《文渊阁书目》和《四库全书总目》等。

二、史志目录。史志目录截止明末,计有14种,若加上《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和各种补正史艺文志,也为数不少,主要代表作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等。

三、私家目录。私家目录截止明末,计有77种,加上清代和民国,估计不下4000种。著名之作主要有:《七志》、《七录》、《七林》、《古今书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宝文堂书目》、《百川书志》、《澹生堂书目》、《绛云楼书目》、《千顷堂书目》、《也是园藏书目》、《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传是楼书目》、《孙氏祠堂书目》、《爱日精庐藏书记》、《郑堂读书记》和《书目答问》等。

以上三大系统,互相影响,代代相继,从未间断。截止建国前夕,所编各种各样目录之书,约有4000余种。

在《别录》和《七略》的影响下，我国提要目录的编制，先后形成三大体例：

一、叙录体。刘向在校书的时候，对每书“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序》）。这种提要的内容，包括书名、篇目、著者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校正错讹，版本考证，书的内容，以及对书的评价等。其后出现的《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均称杰出之作。

二、传录体。传录体是“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虽起自王俭《七志》，实系从《别录》、《七略》脱胎而来。来新夏认为：“传录体是比叙录体内容简略的一种体例”（《古典目录学浅说》）。二者只是“详”和“略”的问题，没有什么多大区别。

三、辑录体。辑录体虽以《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主要代表，但它留有《别录》和《七略》的某些基因。主要是辑录史志目录、公私目录，以及正史列传、原书序跋、笔记、诗话等有关资料而成；但又不乏自己的按语。很便于研究某一专题的人使用。

此三种体例，以叙录体为主流，互相渗透，然各有千秋。到了清代，当纪晓岚领编《四库全书总目》的时候，将三者熔于一炉，使古典提要的撰写，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别录》和《七略》的影响下，古籍目录类目的设置，日臻完善。《七略》除辑略为总序外，计分：

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诗赋略：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

兵书略：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

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以上凡7略38种603家，在中国图书分类史上，占有划时代的地位。以后出现的四部法、五部法、六部法、七部法、八类部法、九类法、十类法、十二部类法、十三部类法、十七部类法，以及详分法，都以其为宗。总的趋势是，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加以变通、损益和完善，使其不断向前发展。

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在分类、著录上，悉依《七略》。仅把《七略·辑略》（总序），置于其它六略之前，大、小序分列于6略及38种之后，仅仅增加新的著述罢了。

王俭的《七志》与《七略》相较，也有雷同之处；阮孝绪的《七录》，虽对《七略》作了合并和大类名称的改变，但留有明显的痕迹，如经典录是《七略》的六艺略，但毕竟较《七略》有所发展。

至于四部法，从甲、乙、丙、丁到经、史、子、集，仍不失《七略》的创意；甲部相当于六艺略，收经部书；乙部相当于诸子、兵书、术数、方技略，收子部书；丙部系六艺略中，春秋目所附史部别出与扩展而成，收史部书；丁部即诗赋略，收集部书。仅在次序上加以调整，便成为永制。而《四库全书总目》则集前人之大成，把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体系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别录》和《七略》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我国独特的目录学理论体系。唐毋煊在谈到目录学的意义时认为：“夫经籍者……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籍，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已！”（《古今书录·序》）而与之同时代的高僧智升，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舛赘，欲使政

教伦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开元释教录·序》)均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

到了宋代,随着目录工作的不断实践,目录学理论也日趋完善,出现了《校讎略》专著。作者郑樵在强调类例的重要性时指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把图书分类,提到学术高度来认识,并升华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著名论点。同时,提出“详今略古,存佚皆取”的收书原则,以及提要“泛释无义”的论断。这些比较系统的理论,奠定了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基础。

到了清代,由于公私藏书事业的发展,书目的大量编制,考据学的兴盛,目录学一度被称为“显学”。其理论也更加精辟,章学诚的《校讎通义》被视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理论的高峰。他指出目录学的功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写类序是为了“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写提要是为了“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之所言有物而行有恒者,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并指出:古逸宜存、家法宜辨、剪裁宜法、逸篇宜采、嫌名宜辨、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方志宜选、谱牒宜略、考异宜精、版刻宜详、制书宜尊、禁书宜明、采摭宜详,以及互著、别裁的分类与著录原则。这些理论被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理论之精华。

目录学之所以如此久经不衰,是因为它象原子反应堆一样,含蕴着无尽的活力。换句话说,第一它有广阔的实践阵地,第二它有系统的理论,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

清人王鸣盛认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十七史商

榘》)。张之洞在《輶轩语·语学》里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至于经注,孰为史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至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读一过,即落知学术门径矣!”余嘉锡也说:“目录书者,所以告学者以读之方,省其探讨之劳也。”“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之学,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这些可谓至理名言。

所以,大凡治学之士,都很注重书目和洞悉目录学。象《西谛书目》,是郑振铎先生的家藏书目,在这个书目里,他收入的诗经、楚辞,各代作家的别集、总集,以及戏曲、小说面面俱到,都是为其研究工作服务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之所以收藏一些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研究之便和手头应用需要的。”正因为如此,他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有卓越的成就。他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都有独到的见解。

有的学者,不仅自己喜爱书目,给初学者开列书目,遇到好的书目,还向他人推荐。1926年,鲁迅曾从日本友人处得到《内阁文库书目》、《也是园书目》,把它刊登在《语丝》上,并介绍道:“此虽止简目,当亦为留心小说史者所乐闻也,因借《语丝》以传同好。”

当然,由于公私目录能反映一代藏书或一代著述之盛,对于整理古籍至为重要:不仅可鉴古籍之真伪,考古籍之存亡,索佚书之涯略,明篇名分合和卷帙增减;而且可考书名之同异,古籍之完缺,版本之沿革和优劣,以及可知学术源流。

那么,就技术革命和科学研究来看,科学上的继承、借鉴、交流和综合,在当代物质条件下,主要是靠技术情报的交流。如果不具备

目录学知识,就不可能及时地把静态的文献变成动态的文献,发挥其更大的效益。因为随着科学技术广度与深度的发展,为文献带来了新的时代特点:数量庞大,类型复杂,出版分散,重复交叉。面对如此纷繁的现象,只有编制和利用各种目录、索引、文摘,去揭示文献的内容与本质,才能开阅读者的视野。从这个角度上看,古老的目录学,将永葆其青春。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像索引学、文摘学的独立存在一样,电子计算机在目录工作中的应用,将使目录学的功用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在为读书的良师、治学的门径、科研的指南方面,更富有其现实意义。

我国目录学的发展,至今已有 4000 年的历史,在漫长的人类长河中,不仅形成过几次高潮——开山祖的汉代,创四部的南北朝,私家目录勃兴的宋代,称显学的清代,以及容纳新学的近代;而且涌现出 2000 多名目录学家,其目录学作品,不下 4000 来种。汉代的刘向、刘歆、班固;魏晋南北朝的荀勖、僧佑、王俭、阮孝绪;隋唐的许善心、魏征、毋煊;宋代的郑樵、晁公武、陈振孙;元代的马端临、钟嗣成;明代的晁瑬、祁承业;清代的钱曾、纪昀、章学诚;近代的张之洞、徐树兰、梁启超;现代

的余嘉锡、汪国垣、姚名达等,可称为一流目录学家。而智升、刘昉、王尧臣、欧阳修、王应麟、脱脱、赵定宇、焦竑、季振宜、孙星衍、缪荃孙、文廷式等,可称为二流目录学家。杨仆、郑默、谢灵运、牛弘、道宣、李淑、高似孙、胡应麟、于敏中、瞿绍基、井俊起等,可称为三流目录学家。当然,这样划分很不确切,应当说各有千秋,群星灿烂。

在如此众多的目录学家中,有些人虽非专攻目录学,但在治学中,或得益于目录学,或根据需要,撰写一些书目,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目录学做出了贡献。如梁启超撰有《西学书目表》等数种目录学著作,在著录、分类诸方面有创新,将图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三大部类,打破四部旧制,为新的分类法产生开辟了道路。再如王国维,其所纂《曲录》,收录极富,为戏曲目录中之佼佼者。

已作物故的先贤们,以及在世的博雅君子,用血汗凝铸了我国的目录学。为了开发文献资源,加强情报服务,我们应促使我国的书目事业和目录学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省图书馆。

来稿日期:1989.7)

《纪念刘季平文集》出版发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任理事长刘季平同志为发展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和推动图书馆学研究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为了缅怀和学习他,由刘老的家乡江苏省如东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纪念刘季平文集》。

这本文集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介绍了刘老的生平、思想和见解,反映了他在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副市长、山东省和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文化部顾问、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期间的工作,体现了刘老坚定的党性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鲜明立场,对事业尽心尽职的可贵精神和在理论研究上的科学态度。它的出版发行将为图书馆提供一本学习革命前辈,发扬优良革命传统的好教材。

《纪念刘季平文集》共 17 万字,每册(含邮资)3.3 元,1989 年 10 月发行。各地图书馆学会可直接向江苏省如东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订购,邮政编码 226400。(刘昌年)

Confucian idea on bibliography/Wang Jinqing//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9,15(4). -42~47

Confucius was a great Chinese ancient ideologist and educationist. He was also the first expert of sorting out documents in Chinese history. Confucian idea on bibliography produced in sorting out documents, which involved much bibliographical work. It includes the document collection idea of "incorporating things of diverse nature", the document screening idea of "no taking of ghosts and Gods", the document revealing idea of "no blurred" and "speaking authors' meaning", and the order of arrangement idea of "putting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When Confucius revised "Six Classics", he used 4 orders of arrangement, by logics by regions, by time sequences, and by ancestors first and clans afterwards. In a sense, Confucius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ree-level classified catalogue.

Confucius — — — Research

History of bibliography — — — China

G257.09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ibliography/Shen Chang//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9,15(4). -48~51

The word of bibliography is of long-standing. The first special bibliography "Bing Lu", the first summary bibliography "Bie Lu", & the first national bibliography "Qi Lu" appeared in the Han Dynasty. On this basis, three systems of Official Bibliography, History bibliography and private bibliography formed; the narrative, biographical and compiling systems for cataloguing produced and over 2000 bibliographers and 4000 works emerged. In order to develop document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information service, we should impel our bibliography work to develop continuously.

History of Bibliography — — — China

Bibliography — — — Review

G257.09

Chinese Libraries in the 1930's — as viewed from early IFLA records/A. J. Evans, A Translated by Li Bing//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9,15(4). -52~54

China was in effect one of the 15 founding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before 50 years. In January of 1928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informed that Dr. T. C. Tai, librarian Tsing Hua College, as chief delegate (and Mr. T. L. Yuan, associated director, Metropolitan Library, Peking, and so on) have been appointed to attend the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Library and Bibliographical Committee held in Rome. In 1932 Mr. T. L. Yuan by then the libraria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in Peking, representing the Chinese Library Association, attended the 5th Session. In 1935 meeting Mr. C. P. Wong gave a summary of the work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Mr. Yu, Houo-Joei was the representative at the 1936 meeting. After this there was no Chinese delegates attending the meeting for a few years. In 198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returned to membership of IFLA. China sent Ding. Zhigang, deputy director of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nd vice-president of a council of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as representative to the meeting. It was indeed very inspiring. The membership of China is a very active one. There is